

CHINA
ECONOMICS POLICY

共和国经济 大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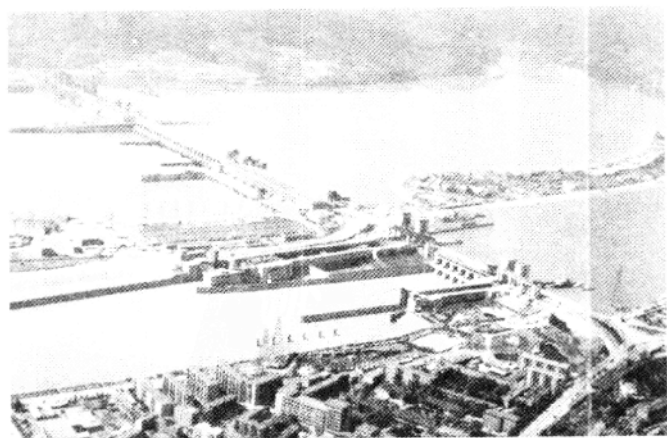
王瑞璞 郭德宏 / 主编
季晓楠 张湛彬

[第四卷]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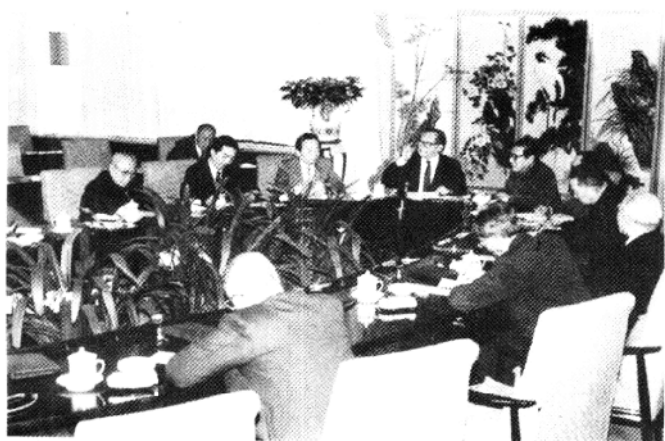
我国最大的水电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89年9月21日,在“两会”期间,李先念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等领导同志在一起讨论打破西方经济制裁等问题。



1990年6月19日,江泽民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要继续稳定和完善。



1990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图为江泽民在座谈会上讲话。



1991年2月18日,邓小平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的陪同下,到上海南浦大桥工地参观,指出上海要加快发展,以此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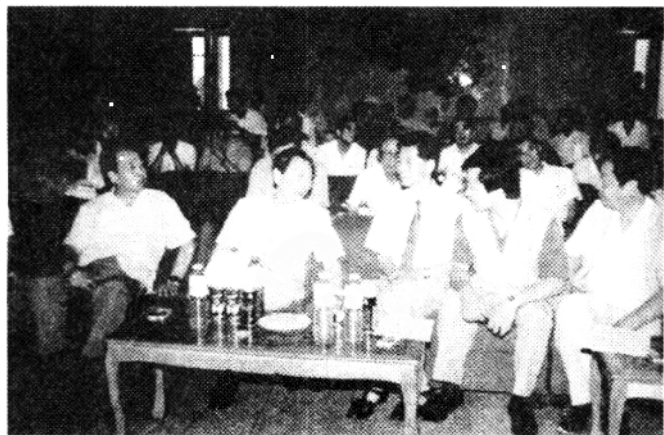
1991年4月25日,四位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右起)获“863计划”荣誉证书。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城市,并发表重要谈话,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和中共十四大召开定下了基调。图为邓小平在深圳特区视察。



1992年6月9日,中共十四大召开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讲话,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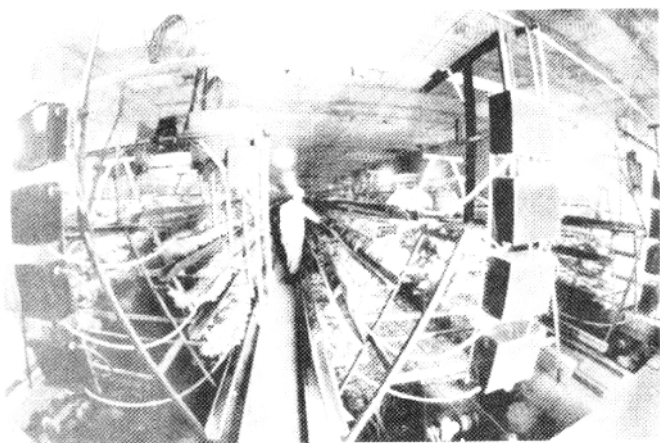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心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图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视察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时与市场主任和出市代表亲切交谈。



1992年5月15日,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视察北京新技术开发试验区。



1992年11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个固定的人才交流场所——北京人才市场开业。它是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才合理配置和使用而设立的。



1992年正式成立的大连韩伟企业集团,是中国第一家以私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集团。图为集团养鸡场。



1994年2月28日至3月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图为江泽民、李鹏在会议上。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图为江苏华西村农民购买的小轿车。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万丰村走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被称为中国共有制的发源地。图为万丰村农民新建的西式洋楼。

目 录

4

□ “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经济现象	1
□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的创租与寻租	16
□ 经济改革的教训和弯路	71
□ 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88
□ 经济发展面临以改革促调整的新阶段	103
□ 十年规划和“八五”纲要出台	114
□ 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	122
□ 小平南巡为中共十四大定下了基调	135
□ 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	156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169
□ 中国沿海、沿边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185
□ 笼子已破、群鸟竞飞	194
□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争	215
□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决策的形成	224
□ 1992 年中国房地产写真	240
□ 深圳证券市场的艰难崛起	278
□ 在改革中规范化的中国股份制经济	296
□ 经济失信现象形成的原因分析	310
□ 来自农村的问题	315
□ 我国市场经济形成的当前情况和中期前景	346
□ 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	384
□ 经济改革：渐进与激进的结合	398
□ 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深层理论反思	412
□ 改革 15 年后的国有企业	423
□ 产权交易：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催化剂	452
□ “第三者插足”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	469

□ 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和天下最贵的企业制度	482
□ 国有金融支持经济改革的理性思考	496
□ 地区非均衡发展中的“民工潮”现象	508
□ 一波三折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	529
□ 私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	568
□ 值得深思的珠海“巨人”现象	579
□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后的“过热”治理	594
□ “软着陆”后的中国宏观政策	639
□ 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	676
□ 面向新世纪的第一个中长期计划	694
□ 面向新世纪共和国经济	706
□ “863”计划的提出与确立	721
□ 科教兴国战略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崛起	735

“一放就活、一活就乱、 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经济现象

改革有无过渡阶段

改革,在客观上有没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指出:“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加”。这就是说,改革存在一个过渡阶段。但是,在十年改革中,人们对改革的过渡阶段并不十分明确,或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以致十年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折腾,而且旧的折腾已涂上了新的色彩。事实上,改革已走过十年的路,离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不近。如果在下个十年中能够顺利形成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的改革也算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照此算来,改革的过渡阶段也要二十年。

我提出改革过渡论,是从中国是个大国出发,从中国又是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出发。这样的大国推进改革,绝无可能用“一刀割掉狗尾巴”的办法“一步到位”。只能用“爬楼梯”办法稳步推进,不能一步登天。发展不可急于求成,改革也不可急于求

成。有人一见改革中出现矛盾,就说这是改革不彻底、改革不配套、改革不完善造成的。这说明我们并没有明确肯定改革的过渡阶段,也没有按照改革过渡阶段的矛盾特点,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致引出两个矛盾:在经济运行上表现为“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怪圈;在改革运行上表现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

新一轮的争论不可避免

新一轮的争论不可避免。争论的焦点是:十年改革中市场多了还是少了。争论的实质:利用机制扭曲的市场调节多了,还是塑造合理的市场机制步伐慢了。实际上,这场争论代表着两派极端的改革主张之争。这就是改革的计划化取向派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派之争。

(一)改革的计划化取向派的主张。

计划化取向派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困难的深层原因,主要是把机制扭曲的市场调节引入投资分配领域,并同投资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导致结构严重失调,形成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合理,诸如能源、交通和基本工业原材料以及粮食生产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加工工业内部比例也严重失调,而加工工业结构又与消费结构失调,这种结构失调造成大量加工生产能力放空。这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速度与效益相矛盾的集中表现。

主张改革计划化取向的一派认为,在没有形成总量制衡机制的条件下,利用机制扭曲的市场调节,调节金融市场,过度推行负债经营,会造成信贷投资规模膨胀,带动出通货膨胀,导致国民经

济运行的大起大落,造成国民经济运行效益低下。

看来,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分析没有道理。问题出在,主张改革计划化取向的一派既没有弄清旧体制弊端的根源,也没有弄清楚改革中失误在哪里,他们说市场搞多了,而没有区别在什么领域市场搞少了,在什么领域市场搞多了。事实上,改革的失误在于否定改革过渡阶段的特殊矛盾,没有把企业再生产领域与投资的扩大再生产领域区别开来,分别对待。企业再生产是现存产业结构的再生产,它要求在可能范围扩大市场调节,按照社会需要校正现存产业结构失调部分,所以说企业再生产领域市场调节是少了,而不是多了;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领域来分析,是机制扭曲的市场调节多了,使得已经失调的产业结构更加失调。他们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所以他们提出的对策,不是从推进深化改革中找出路,而是企求用行政集中的办法解决矛盾。这实际上是走回头路的办法。

(二)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派的主张。

市场化取向派也指出十年改革中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益低下,这是速度与效益相矛盾的根源。从现象上看,这一派论点同改革的计划化取向派基本一致。但是,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市场化取向派认为,十年改革市场化程度太小,市场化速度太慢,而且十年改革中有些改革措施不符合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具体说有三项:

1. 改革起始阶段向企业放权让利,不是改变企业机制,这是改革的失误。而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性分权,更是一种改革失误。他们认为市场分割现象只是行政性分权的产物。

2. 不该放开一部分产品价格又管住另一部分产品价格。一种产品实行“双轨制”价格,形成一物多价,违背了市场原则。

3. 没有形成企业自负盈亏机制,没有坚持企业间的平等竞争、

优胜劣汰原则,没有大胆让一部分效益低的企业大量破产关闭,不敢让这部分企业职工大量失业。

他们主张推行“一刀割断狗尾巴”的改革路子。他们指出中国十年改革的失误,具体表现有三条:一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明确;二是市场化改革的态度不坚决;三是市场化改革的措施不系统。

如果我们把问题说白了,主张改革市场化取向的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困难的深层原因,就是中国还没有下定决心走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子。问题又回到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的选择上。

改革过渡阶段要选准目标模式

“一步到位”的改革主张,显然是过于理想化的追求。改革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在改革过渡阶段,首要的头等大事是选准改革的目标模式。

中国一开始就宣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改革。改革是社会进步,改革是一场革命,所以我们党始终批判那种以倒退复辟为目的的“全盘西化”的思潮。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重申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路线,重申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改革目标模式。重申这个改革目标模式,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一是重申计划经济,明确拒绝以市场化作为改革取向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一派主张。二是重申市场调节,明确拒绝以计划化作为改革取向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的一派主张。

但是,中共中央坚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目标模式,在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在经济理论界一部分人中至今尚未取得共识。

目前,仍然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只接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而不愿接受计划经济的提法。其实,计划经济有两个模式:一种是以调节产品经济运行作为对象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也就是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国外称它为中央计划经济。这种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合而为一,计划经济就是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另一种是商品计划经济模式,商品计划经济模式同产品计划经济模式不同点很多,首要一点就是把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完全分开。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然要由许多计划指标组成。但是,这些经济发展指标需要经过综合平衡,检验总量是否平衡,结构是否合理,国民经济能不能协调、稳定、持续地发展,这属于计划经济固有功能管的事。计划经济用什么功能来管这个事?我的回答是计划经济的制衡机制。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套宏观经济制衡机制体系。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改革产品计划经济的扩张机制,塑造商品计划经济的制衡机制。一旦形成商品计划经济的制衡机制,这种计划经济再也不属于主观范畴的东西,而成为制衡主观决策与客观实际背离的有效机制。为此,我建议经济理论界要更新计划经济观念,抛弃产品计划经济的老观念,建立商品计划经济的新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取得计划经济的共识。这是中国改革的大事。

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是个什么关系,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怎样结合?这两个问题理论界也未取得共识。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只能从调节主体上理解才能说清楚问题。计划经济的调节主体是国家(包括人代会系统和政府系统),市场调节的主体是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